

对劳动管理型企业的经济学研究： 一个方法论的述评*

杨瑞龙 卢周来**

一、引言

早在19世纪，工人自治企业以及合作社就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穆勒（J. S. Mill）、瓦尔拉斯（L. Walras）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都曾涉足此领域。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劳动管理型企业（Labor-Managed Firm，下称LMF）。但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LMF的研究却相当边缘化。从目前国内企业理论的研究情况看更是如此。已有的文献中除了极个别的简单的综述，几乎都是讨论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型企业及其治理。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很少讨论LMF理论，这需要我们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予以审视。

我们把LMF的研究按方法划分为四种：即以瓦尼克（Jaroslav Vanek）为代表的新古典方法；以汉斯曼（Henry Hansmann）为代表的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契约理论方法以及以道（Gregory Dow）为代表的企业治理分析方法。通过回顾与讨论，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三个问题：其一，LMF研究在现代经济学中面临怎样的困境？其二，各种现代经济学方法应用到LMF研究中，其优点与缺失有哪些？其三，有没有可能寻找一种更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关于LMF的研究方法？

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研究的客观性，即经济学家不能以价值判断影响其研究结果；二是研究的形式化，即要能将所讨论的问题以一般化模型进行处理；三是研究的可证实性，即研究结果要能被统计数据或经验观察所检验。受研究目标的限定，本文没有涉及LMF讨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人本主义经济学方法和奥地利学派。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瓦尼克及其他人的新古典方法，并探讨这种方法所存在的主要缺陷。第三部分对以汉斯曼为代表的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进行了评论，并且对新古典和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第四部分介绍了有关LMF

的契约理论文献。第五部分，对以道为代表的企业治理理论方法进行了述评。最后第六部分进行小结，试图对前面提出的问题进行扼要解答。

二、LMF研究的新古典方法及其兴衰

以新古典方法研究LMF的先驱是沃德。沃德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为此他建立了将LMF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传统新古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批准号：7047206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批准号：01AJL008）的资助，特此致谢。

** 作者杨瑞龙，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卢周来，1970年生，中国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091）。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劳动者管理型企业是广义上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了工业产业中的各种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组织形式，也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农业或手工业合作社（Co-operative）。但此综述中更多地涉及前者。

杨其静：《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见杨瑞龙主编《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卡尔米（Kalmi）在关于合作社研究的一篇综述中曾将合作社研究方法概括为两种：即新古典方法与制度经济学方法。

参见 Sheila C. Dow, *Economic Methodology: An Inqui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4—75, 163—269.

Branko Horv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 Marxist Social Theory*. M. E. Sharpe, 1982.

马克·卢兹、肯尼思·勒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David Prychitko, *The Critique of Workers' Self-Management: Austrian Perspectives and Economic Theory*.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3, 1996.

Benjamin Ward,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1958, pp. 566—89.

典企业进行比较研究的传统。沃德的结论主要是：在传统企业运营有正的利润的环境下，LMF 雇佣劳动水平以及产出都将低于传统企业。因而，LMF 企业对外在环境的变化与传统企业相比较更缺乏弹性。他在研究相关 LMF 案例时发现，LMF 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 LMF 的产出甚至在产品价格上升时将下降。这一现象被后续文献称为“沃德效应（Ward effect）”或者“反常供给反应（Perverse supply reaction）”。

瓦尼克在将沃德所讨论的问题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出版了其名著《劳动者管理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这本著作是他所处时代对 LMF 进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最杰出代表。

为了方便对 LMF 进行一般化研究，瓦尼克首先对 LMF 给出了重要的假设：其一，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LMF 中的决策权由雇员控制，企业内部实行一人一票制。其二，LMF 是纯租赁型企业。雇员并不拥有但租赁资本。资本回报受限制，即享有固定利息收入。其三，雇员分享企业产生的利润，也就是说，LMF 企业并不是按契约支付工资，而是获得剩余收入。其四，在 LMF 中，雇员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瓦尼克同意沃德关于 LMF 更缺乏价格弹性的结论。并认为，与古典企业相比较，LMF 的确倾向雇佣更少的劳动，使用更多的资本密集技术，并且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更为迟钝。

但瓦尼克与沃德的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一，瓦尼克不承认“沃德效应”的存在，他认为反常供给反应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特例。其二，尽管瓦尼克承认 LMF 倾向于雇佣更少的劳动力，但他并不认为 LMF 制度下宏观经济中将会有更多失业。其原因是，LMF 生成的速度将快于传统古典企业，而这些新生的 LMF 会消化经济体中额外的租金并且恢复完全就业。其三，瓦尼克认为，因为 LMF 对于扩张的积极性很低，因此，垄断性竞争以及与此联系的福利损失将比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少。其四，瓦尼克认为，LMF 比资本雇佣劳动型企业更富效率。

瓦尼克的研究掀起了关于 LMF 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其著作问世后几年中，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关于 LMF 的文献。在瓦尼克获得教授资格的康奈尔大学，还专门成立了 LMF 以及合作社研究机构（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of Co-operatives）。瓦尼克随后又先后出版了《分享经济》（*The Participatory Economy*）等著作，对劳动自治型企业的演化路径进行了非正式讨论。诸多瓦尼克的跟随者在传统的新古典框架下继续探讨。关于 LMF

的新古典模型甚至进入了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然而，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瓦尼克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受到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尽管瓦尼克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用新古典方法研究 LMF 的最高水平，但其方法论却存在十分矛盾之处。其原因在于，瓦尼克倾向于或者说偏爱 LMF，而他对 LMF 的偏爱却不符合正式的微观分析方法。因为瓦尼克认为，在 LMF 企业中，劳动者具有自我管理的真正动力，而这种动力来源于劳动者被尊重、劳动者的生命质量更高以及劳动者的工作努力的价值更易被认可并体现出来，因此，瓦尼克将 LMF 称为“人性化企业”。在他看来，资本控制型企业中恰恰相反，劳动者不被尊重，是被监督的对象，生命质量更低，因而 KMF 被瓦尼克称为“反人性”的。然而，瓦尼克关于人性与反人性的讨论，却超出了新古典的分析范式。瓦尼克自己说，积极的产出是劳动管理型企业固有的品质，而不是由微观理论工具可以推导出的。于是理论逻辑就发生了冲突：瓦尼克力图用微观经济理论分析 LMF，但他不得不在其微观经济理论视野之外给出了一个高于其体系的先验性假设。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开头部分使用了新古典效用概念（基于资源使用的最优化）并且将 LMF 与 KMF 放在平行的位置加以审视，然而在第二部分他采取了不同的效用标准，并且认为劳动管理型企业更好是因为它更符合人性，更仁慈。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在后续著作中体现更甚。如在《分享经济》一书中，由于他在试图将关于“人性化”的假设与新古典微观理论结合成一个模型时出现了问题，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非主流经济分析方法来处理。

因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瓦尼克背离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客观性标准。而经济学要求经济学家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客观事实，而不是将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强加于分析之中。“而有趣的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包括瓦尼克本人的一般理论，常常强调分析的客观与公正，但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说法并不可信。实际上，关于经济民主化的道德问题总是这些研究的主

以下对瓦尼克著作内容的转述均参见 Jaroslav Vanek,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bor-Managed Market Econom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Hugh Gravelle and Ray Rees, *Microeconomics*. London: Longman, 1983, pp. 346—355.

参见 Panu Kalmi, *The Study of Co-operatives in Modern Economics: A Methodological Ess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gress, Mapping Co-operative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3.

要动力。而这种道德热情妨碍了瓦尼克研究的客观性”。

主流经济学还认为，瓦尼克对资本主义企业批评太过。因为瓦尼克如此急于将 LMF 的假想结构与新古典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假想结构对比，因此，他再次先验地认定，新古典企业就是真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工资是固定的，雇员因此都试图最小化其努力程度，并且受到被监视和解雇的威胁，使 KMF 效率低于 LMF。然而，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其实并不追究企业的真实结构。而真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具有很大的适应性，甚至也能使用瓦尼克认为是劳动管理型企业所独有的团体激励计划以及共同治理的实践。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瓦尼克关于 LMF 效率比 KMF 高数倍的说法纯粹是夸大其词，他过高地估计了 LMF 的优点，而低估了 KMF 的潜在效率。

在可检验性方面，也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对瓦尼克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现实中惟一与瓦尼克所言的 LMF 多少有些相似的就是前南斯拉夫的企业。而主流经济学认为，南斯拉夫企业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价格及其他控制下的牺牲品。现实中可观察得到的 LMF 企业与观念中的 LMF 企业并不相符合，因可以说，证实瓦尼克理论所需要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瓦尼克的方法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是由他发起的关于 LMF 的研究计划在 80 年代末转向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LMF 研究的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及其优劣

用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研究 LMF 始于 70 年代中后期。其先驱者包括了菲吕博顿 (Furubotn)，波维克 (Pejovic)，詹森 (Jensen)，梅克林 (Meckling) 等人。与新古典方法重视理论化与模型化不同的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核心分析方法之一，交易费用方法更偏重于经验细节。其中尤其关注到了 LMF 内部与外部的各种交易过程以及所有权不同可能导致的交易费用的不同。比如，Furubotn 和 Pejovic 对南斯拉夫企业的研究中，关注了原来的新古典文献所没有注意到的三个问题，即社会所有制下投资激励不足、管理行为误导以及集体决策过程。而对这些问题的强调源自于这些研究者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的经验观察。詹森和梅克林则在他们的研究中利用产权分析框架，从而发展起另外的与沃德与瓦尼克新古典传统泾渭分明的新制度传统。与沃德以及瓦尼克早期关于在一个严格界定的目标下劳动力同质以及每个工人追求最大化收入假定不同的是，该流派都试图

强调个体的异质性以及自利行为。这使得对 LMF 的研究进入了集体决策过程。詹森和梅克林后来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现实中很少有企业自愿采取类似 LMF 这样的结构。因而他们更关注为什么 LMF 在现实中如此罕见。

波纳斯 (Holger Bonus) 在其《作为一个企业的合作联合会：一个交易经济学的研究》的论文中，明确提出其讨论建立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上。他认为，在 LMF 内部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合作社的主要集体组织优势来自于，将关键交易内部化到由交易专用资源共同拥有的企业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外部机会主义对其投资产生的准租金的潜在威胁，同时，其内部的“合作精神”又足以控制内部机会主义的威胁。因而，他认为 LMF 是交易成本很低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LMF “本身前景光明，并值得把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进行分析”。

在上述成果基础之上，汉斯曼的著作《企业所有权论》是以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研究 LMF 以及合作社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这本著作的最基本特征是，它并不是一个一般的 LMF 理论，而是关于企业

Panu Kalmi, *The Study of Co-operatives in Modern Economics: A Methodological Ess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gress, Mapping Co-operative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3.

John P. Bonin, Derek C. Jones and Louis Putterma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Producer Cooperatives: Will Ever the Twain Me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 1993, pp. 1290—1320.

如 Eirik Furubotn and Svetozar Pejovich,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Firm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Example of Yugoslavia*,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0, 1970, pp. 430—454. 以及 Eirik Furubotn, *The Long-Run Analysis of the Labor-Managed Firm: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1976, pp. 104—123.

詹森、梅克林：《权利与生产函数：对劳动者管理型企业 and 共同决策的一种应用》，迈克尔·詹森等《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同上。

波纳斯：《作为一个企业的合作联合会：一个交易经济学的研究》，埃瑞克·菲吕博顿等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以下对汉斯曼著作内容的引述与转述均参见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所有权的一般理论，它讨论了 LMF 以及合作社的不同类型，同时也讨论了其他组织形式以及所有权结构，包括投资者所有企业。

汉斯曼的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建立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般遵循一个简单的实践，首先检查在什么环境下发现了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然后寻找可以用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模型的理论”。而这种方法如汉斯曼所说的“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并不普遍”。因为最典型的新古典方法总是从理论开始，然后试图用经验来验证理论，甚至有时将理论强加于实践。而汉斯曼的著作深深植根于现实中 LMF 以及合作社的实践。与其他理论着重解释为什么合作社如此之少不同的是，汉斯曼试图解释为什么合作社在某些产业中实际上有优势，而在其他产业中却没有优势。

汉斯曼所依赖的元理论除了 Jensen 和 Meckling 所使用的代理理论之外，他更多地依赖于交易费用理论以及阿克劳夫 (Akerlof)、斯蒂格利兹 (Stiglitz)、斯彭斯 (Spence) 等人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汉斯曼的任务是解释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某种所有制结构。他回答了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农业生产者更愿意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出卖其产出而不是将他们卖给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是什么使得 LMF 在某些因素下比其他所有权形式更有效率？

汉斯曼对为什么会不同所有权安排的解释是，企业将选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所有权结构。而交易成本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契约的成本以及所有权的成本。契约的成本来自于诸如信息不对称以及策略行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专用资产投资：如果代理人 B 利用机会主义行为阻止代理人 A 从专用投资中得到公平回报，那么代理人 A 将不愿意投资在交易专用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的重新配置将有益。比如，如果农民害怕其买主利用需求低迷压低产品价格，或者害怕产品易腐，他们可能不愿意投资于其农作物。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如果雇员控制企业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他们可能更愿意投资于企业专用人力资本。正因此，汉斯曼认为，在契约成本方面，LMF 以及农业合作社可能比传统古典企业或 KMF 更有利。但汉斯曼同时又认为，LMF 以及合作社的所有权成本常常很高。在汉斯曼的分析框架中，所有权成本包括代理成本（维持管理的成本）、风险承担成本以及集体决策成本。而正是所有权成本可能会使得 LMF 以及工人合作社处于劣势：雇员不得不对诸多不同问题进行集体决策：工资、工作条件、租赁或解雇工人、投资等等。而雇员在这些问题上的偏好各异：取决于诸如年龄、期望任期、财富、风险厌恶

等。这使得决策过程变得十分昂贵：通过会议、讨论以及投票、撤销早期决定、调节迟缓等等。因此这使得工人所有企业在决策上与资本控制型企业相比较效率更低。

汉斯曼的研究结论还对某些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比如，古典企业理论认为，资本密集程度与专用性程度及固有风险，是决定该产业的企业应该由资本者所有的关键性因素，而汉斯曼认为关键性因素是所有权成本更低；传统理论认为 LMF 的优势是提供给雇员平等参与的机会，而汉斯曼认为事实上这正是 LMF 的缺陷，它导致所有权成本过高，这是导致 LMF 稀少的基本原因；传统企业理论认为 LMF 无效率，而汉斯曼明确指出：雇员所有权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要更有效率。

汉斯曼的基本观点建立在交易成本的基础之上，而交易成本却不容易测定。因此，汉斯曼必须做出其他假设以支持其结论。汉斯曼于是利用了新制度学派另外一个假设：仅仅那些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才能在市场中存活下来；而那些较低效率的所有权结构在竞争性市场上将无法生存。或者说，如果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无效率的所有权结构，所有者将能够从改变所有权结构中获益。正因为有效率的选择过程的新制度经济学假设与汉斯曼所使用的方法论相符合，这使得其观点可以自我解释。

对于 LMF 研究，汉斯曼的著作包括了一些比瓦尼克时代的著作更吸引人的特征。首先，汉斯曼的著作是关于所有权的一般理论而不仅仅是关于 LMF 和合作社这种特殊组织的理论。其次，他明显倾向于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而不像瓦尼克时代的著作在讨论一个假设的经济制度。再次，他采取了一些标准化的假设而不至于使其像瓦尼克那样受到“在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眼皮底下天然地抬高劳动的价值”这样的批评。

当然，汉斯曼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研究视野局限。因为汉斯曼将精力集中于解释现存的所有权结构，因此他并没有特别关注为何 LMF 可以更有效地运转以及为什么 LMF 可以扩大这样的问题。加之汉斯曼的绝大多数政策建议与美国的法律相关，因此这可能降低了美国之外 LMF 研究者的兴趣。

其次，汉斯曼的方法存在过于实用主义的倾向。例如，仅用利润衡量的效率来解释那些现存的持续性与结构性现象。尽管汉斯曼的著作采取了新制度假设，即存在的就是有效率的，但这一假设本身在主流经济学界就存在很大争议。即使是某些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已经注意到，关于存在的就是有效率的观点其实是同义反复。而且更致命性的矛盾在于，既然存在的

就是有效率的,那么,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中稀少的所有权结构就在于其低效率。而汉斯曼又承认,至少经验研究表明,现存的LMF并不比传统企业效率低。

再次,交易成本存在测度上的困难。要将契约成本与所有权成本进行量化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因此,很难发展起可以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分所有权的统计检验。这种统计检验不得不求助于间接证据,但汉斯曼没有做。因为汉斯曼提供的经验证据是基于案例研究,但并没有提供一个旨在检验在方法论上存在证实的困难的关键性假设的经验主义文献,没有提出任何方法论意义上的正式假设的检验。

最后,关于交易费用与产权经济学方法是否在方法论上比新古典方法更具现实性本身也是有争议的。詹森和梅克林强烈主张采取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方法,并得到汉斯曼响应。但在“是否进行成功的经验检验”的意义上看,沃德—瓦尼克的方法并不必然就不真实。比如,Pencavel就认为,沃德—瓦尼克模型令人吃惊地与美国西北太平洋胶合板工人合作社的案例相符合。而在他们发展起这个模型时,沃德和瓦尼克并没有研究胶合板合作社的案例,因此,他们的模型更具一般性。

四、LMF研究的契约理论方法的兴起

契约理论关注这样的问题:因为不完全以及非对称信息,在所有的可能发生费用上详细规定代理人行为的代理人之间的完全契约,要么是不可能,要么签约过程过于昂贵,这就为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空间。为了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旨在最小化机会主义成本的代理人的控制权以及激励计划安排就非常重要。

将契约理论应用到LMF研究之中的例子是哈特和莫拉。在他们的论文中,引入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完全合同的再谈判模型,集中讨论了公司制度的设计这样一个与决策问题无关的关于剩余权控制安排的事先合约。他们将作为LMF组织形式之一的合作社与外部所有权作为两种极端安排。对于前者,所有权在合作社团体中基于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分享。而在后者中,控制权与剩余收入权分配给出资人。他们有两个主要结论:其一,在完全竞争性状态下,外部所有权安排将达到最优,而合作社则无法达到,因为产生自相对于市场的任何优势的租金,都被用于保护合作社成员免受竞争性压力,因而中位投票人的选择将可能无法反应平衡偏好。其二,在合作社成员拥有共同偏好秩序的情况下,合作社形式将是最优,而外部所有权安排所做出的决策将是低效率的,仅反应出少数人而不是平均消费者的偏好。

在哈特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霍尔格和沃纳瑞德对内部所有权与外部所有权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他们通过引入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外部所有权可能比内部所有权更有效率。其基本立论是,在LMF内部,因为契约的不完全性质,因而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成员不得不消耗大量的资源以用于内部分配性冲突(相当于寻租行为);而KMF形式的外部所有权尽管增加了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冲突,但它减少了总的寻租成本。在均衡中,外部人至少汲取部分企业剩余,使得企业内可供争夺的剩余减少,从而也减少了内部人用于内部分配性冲突的资源浪费。外部人担当了一个“共同敌人”的角色,迫使内部人降低用于内部冲突的总支出。在比较了此时用于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冲突的额外的资源。他们研究认为,外部所有权的净影响是积极的。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提供了为什么一些封闭形式的合作社最终会“退化”成开放性质的KMF:最初,企业内部专用性投资的边际回报很高,意味着出于激励的原因,内部所有权是最优所有权安排;而当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也许就到了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已经耗尽的时候。在这点上,减少寻租成本比刺激企业专用投资更为重要。企业变成外部所有权安排可能成为最优。

除了研究以适当的正式的合约安排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之外,契约理论在LMF中的应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讨论类似“友谊”“对团体的忠诚”等因素在克服正式契约的不完全性可能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78年,克莱因与阿钦那等人在“试图考察使用市场体制的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成本”时,就特别研究了一个由成员共同拥有的乡村俱乐部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LMF既是一个企

关于交易成本测度上困难的一般论述,请参见克劳奈维根编《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John Pencavel, *Worker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the Worker Co-op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1, p. 87.

参见 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s: Members' Co-operatives versus Outsider Ownership*,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2 (4), 1996, pp. 53—69 以及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Cooperatives vs. Outside Ownership*, *NBER Working Paper* 6421, 1998, February.

M. Holger and Karl Wärneryd, *Inside vs Outside Ownership: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Firm*.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2, 2001, pp. 527—541.

业，还是一个社会团体，这一研究对于 LMF 也有很好的借鉴。该研究成果认为，在乡村俱乐部内部，友谊的专用性租金是由每个成员为其他成员付出友谊来筹集的。成员的行为构成一种由有价值的友谊构成的投资，即成员间情趣相投的联系与和谐的环境。每个成员都为其他成员创造一种专用性的和谐气氛而进行投资。成员资格的价值就是由成员相互间情感投资所创造的。而为了防止这种由专用性投资产生的价值的流失，防止个别成员将股份售与“不受欢迎的人”，成员资格一般都需要所有的成员认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Rey 和 Tirole 又专门研究了合作社如何诱导其成员之间的忠诚以防止令人不快的成员的存在，以及合作社新成员的进入与融资问题，该研究对于团体中一些领头学者制造相互协作的理论尤其感兴趣。

关于 LMF 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对正式合同的不完全性可能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的最近成果是富尔顿 (Murray Fulton) 的《合作社与成员忠诚》。文章认为，对成员忠诚的审视对于合作社组织来说是一个优先的选择，而 IOF (investor-owned firm) 则不需要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作区别。而恰恰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差异问题已经被许多 LMF 经济学文献所忽略。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分析开始于这样的假设：即合作社成员或多或少固定并且合作社能在不需要考虑来自于 IOF 的竞争的情况下做出价格决策。总之，成员对团体的忠诚被典型地假设为高而稳定的。而这种高而稳定的成员忠诚的假设，在前一时期现存合作社面临相对稳定的市场时可能是真实的，此时成员的基础可以很好界定，很少有新的合作社形式。但这种假设今天不再可维持。因为合作社面对的市场剧烈变动，至少在美国一些更大的农业合作社不断形成。当然更重要的是，成员资格基础不能再被很好界定。不仅成员越来越不同，而且成员忠诚的传统资源即合作意识被打破了，这篇论文用契约理论的方法检验了成员忠诚在合作社组织中所担当的角色。论文首先认为，历史上成员忠诚是形成合作社的关键开始，这种忠诚的源泉被认为是合作意识。论文然后给出了用契约理论将合作意识模型化方法，同时就这种合作意识对成员的行为以及合作社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成员忠诚对合作社非常重要，但也同时有其成本。成员忠诚可能常常被合作社的运作的低效率所掩盖并且因此对成员的福利有害。论文然后给出了作为传统成员忠诚被侵蚀后合作意识日渐消失后的证据，并认为一旦合作社成员忠诚度下降后，合作社就需要其他特征以区别成员与非成员。

LMF 的契约分析方法，提供给此领域研究者最关键的洞察力在于，其结论认为，没有哪一种合同在

所有的环境下都占优。某些环境下，LMF 的合同很适合；而在另外的条件下，投资者所有权则更有效率。

在许多方面，对合作社研究的契约理论与汉斯曼的交易费用方法在理论框架以及所强调的问题上很相近。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强调合同理论方法以及正式的更数学化的表述。两种方法的相近并不是偶然的。契约理论方法注意到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制度问题，但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使用了新古典文献中常使用的数学方法。但也不能认为契约理论方法是介乎新古典与新制度之间的方法，至少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看，认为契约方法超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方法。后者常常没有办法做到形式化，而且表述上也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规范。

当契约理论方法可能引起经济学家更广泛的注意时，该方法本身引起的过于追求形式化问题再度出现了：为了使模型变得易于处理，所分析的问题被简化，并且现实世界的诸多关键性细节被忽略了。比如，现有的文献常常将两种合同描述成两种极端类型（投资者所有企业与劳动者所有企业）。此外，理论的发展被视为比经验分析或政策含义更有价值。因为这些原因，新近关于 LMF 的契约经济学文献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并非经济理论而是 LMF 本身的研究者来说枯燥无味。

五、企业治理理论在 LMF 中应用

道的新著《治理企业：工人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率先运用企业治理理论分析 LMF 模式。道首先给出了自己对于 LMF 企业的界定。他认为，LMF 的确切含义就是“劳动管理型企业”而不是“工人所有企业”。因此，对 LMF 的研究应该关注控制权，而不是关注所有权。对控制权的重视，给出了一个区分不同组织形式的合理标准。在道看来，KMF 与 LMF 之间的区别就成了最终的与正式的控制权的问题：谁选举董事会？如果答案是“资本提供者”（或者加上少数普通股持有者），那么就是 KMF；如果答案是

Rey Patrick and Jean Tirole, *Loyalty and Investment in Cooperatives*. mimeo,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Toulouse, 2000.

Fulton, Murray, *Cooperatives and Member Commitment*. Working Paper; <http://www.peller-vo.fi/finncoop/material/fulton.pdf>, 2000.

以下对道著作内容的引述与转述均参见 Gregory K. Dow,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劳动力提供者”（或者诸如已有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职工，或者有特定的才能），那么就是 LMF。这种区分避免了过去对 LMF 的定义的纠缠。

道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已有典型 LMF 企业的案例分析，指出 LMF 是有效率的，并且是能够存在的。他指出，现代企业理论必须超越这样的深层次偏见：“LMF 之所以少是因为它们低效率”。做出这样的断言至少有三方面的不足：首先，他们无视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即 LMF 已经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反复出现过（如专业合伙企业以及一些类型的手工制造业）。因此，就需要有足够的理论来解释跨部门与产业的 LMF 实际存在。其次，将有效率或无效率作为 LMF 的主要特征，无法解释从一种组织形式向另一种组织形式的过渡。必须有一个更适当的理论来解释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会由其职工买断（沃尔顿钢铁、阿维斯以及泛美航空），以及什么条件下现存的 LMF 企业会向其传统投资者出卖（投资银行企业、西北太平洋胶合板厂）。最后，更深层次的理论考虑在于，所有的反对或主张 LMF 企业的经济学家都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资本和劳动在物质与制度方面的投入完全对称，那么就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可观察到的组织产出会不对称。相反，无论企业是由资本提供者雇佣劳动运行还是劳动雇佣资本来运行，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尤其没有理由预期 KMF 与 LMF 在效率上的差别。因此，任何天然地认为 LMF 相对于 KMF 低效率（无论是在某个特殊产业，或者是跨产业）的观点可能最终都建立在公开或隐晦地假设两种投入的性质不对称基础之上。

道关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既然 LMF 有效率，为什么在现实中 LMF 的企业组织形式较 KMF 组织形式更为罕见？在用企业治理理论仔细审视了关于 LMF 为什么稀少的已有解释后，他认为，无论是资产专用性理论、工作激励理论以及证券市场多样性理论与集体选择理论，都不是构成 LMF 稀少的主因。而 LMF 之所以稀少的终极原因在于 LMF 内部劳动力的不可让渡性，即不存在成员资格市场。正是由于劳动力的不可让渡导致了融资问题、集体选择问题以及成员地位的商品化问题。而且道还认为，LMF 组织形式存在的最客观问题就是成员资格市场的缺乏。而在如何解决成员资格市场缺乏的问题上，道通过对蒙德拉贡（Mondragon）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一个可替代性方法，即建立个人资本账户，使集体产权个体化，也使得 LMF 的成员在其成员资格被出卖时通过将其价值计算成价格，获得其未来投资回报的现值，这与股票市场从资本家企业中使其投资回报流资本化一样。这一方法还完全可以解决视野问题是

公共财产问题。当然，道也承认，在实践中这一方法还有待证实。

在方法论上，道在某些方面与汉斯曼有类似之处，因为两者都关注那些实际存在的组织形式。但又与汉斯曼代表的新制度方法不同的是，其一，道并不接受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关于“存在的就是有效率的”假说，因而不认为 LMF 的稀少在于其低效率。其二，他在著作中审视了各种经济学解释，包括新古典的、交易费用的以及契约理论的解释，并最终上升到企业治理层面，因此，道使用的方法比汉斯曼代表的新制度方法更接近于现代企业理论方法。其三，与汉斯曼不同的是，道并不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所有权的不同，而是在其结论中提供了一个不同分析方法的综合。

但道的著作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仍然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因为在这本书的开头，道就明确了其对 LMF 的偏爱。道在前言中指出，工人除了关心工资外，还关心工作安全，情感归宿，以及由职工持股或利润分享计划带来的风险。没有归宿感，工人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努力工作；他们不知道雇主所说的话是否可靠；被雇主指定的工人代表，明天就可能被解散，工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因常常被企业“敲竹杠”而无法收回，全球化扩大了市场，但工人在就业与工资方面面临的风险空前增大，职工持股或利润分享计划说起来似乎能够增加工人生产积极性，但要在一生的储蓄都放在老板手中而不是自己能够真正掌握，只要想着这些股票明天也许就变成废纸，工人还是很犹豫。而所有这些困难，都可以在 LMF 中得到解决：工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对企业有归宿感，不必担心被解雇，不必担心被雇主欺骗，他们自己能对自己的投资直接监管。所以，道认为，LMF 相对于 KMF 是一种更好的企业制度安排。道为此专门将著作的第二章命名为“规范经济学考虑”，分析了他所认为的 LMF 企业组织形式在“民主”“人性化”“平等”“尊严”“共同体”等方面的优点。然后特别写了“作者亮出他的底牌（The Author Shows His Card）”一节，声称他毫不隐讳自己对 LMF 企业组织形式的偏爱与钟情。

道同时还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真正在以意识形态影响研究而不自知，并且还打扮出惟恐给人留下道德标准将自动影响结果的公正性的印象。他还认为，主流经济学与现行资本主义 KMF 制度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增强的机制，即主流经济学越强调 KMF 的效率性，越反对 LMF，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发展起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就越偏爱 KMF，也越忽视 LMF 存在的各种政策环境。

此外，道对 LMF 的前提假设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因为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所有权是一组权利，它天然地意味着所有权、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是不可分的。而道却认为，认为拥有所有权就天然地拥有控制权以及剩余索取权，其实是主流经济学的偏见，而在实际过程中，三者其实是可分的。

由于道的著作刚出版不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后续评价与批评预期还会不断出现。

六、若干结论

在本节中，我们将试图回答此文开始时提出的三个问题：LMF 研究在现代经济学中面临怎样的困境，使其处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各种已有研究方法的优点与缺失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主流框架研究 LMF 问题？

如果以引言中所谓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三条标准衡量，除了交易与产权经济学方法在可模型化上存在某些问题外，新古典方法、契约理论方法以及企业治理方法在形式化的模型方面都没有问题。而在可检验性上，各种方法包括新古典方法在内都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障碍，但无法得到经验证实并非衡量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这一问题在关于方法论的文献中被称为 Duhem-Quine 问题。而且主流经济学常常更热衷于建立某种理论体系，而对检验的兴趣反而弱于新制度经济学。

既然如此，为什么 LMF 理论在今天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当然我们必须看到，LMF 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相对于 KMF 来说更为罕见一些是一个客观原因。然而，通过方法论回顾我们发现，存在某种先验性观念是最大的问题。而 LMF 研究者以及主流经济学双方对此都有责任。其实，对 LMF 的新古典研究、交易费用研究、契约理论研究以及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在研究框架上都已经相当主流了，但无论结论是偏向于 LMF 还是反对 LMF，都被视为结论是预先给定好的。凡是研究的结论是偏向 LMF 的，如瓦尼克、道等，就会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对经济民主化有着道德热情，而这种道德热情影响了其研究结果；凡是研究的结论是反对 LMF 的，如 Jensen 和 Meckling，则被视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坚定维护者。而且有意思的是，二者尽管在使用的现代经济学方法上差别甚小，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待遇并不相同。凡是结论偏向 LMF 的，都很难被主流经济学接纳；而凡是结论是否定 LMF 的，都被收入各种主流企业理论文献。

因此，LMF 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尴尬处境其实并非由于其研究方法不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而是

由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回顾历史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LMF 理论兴起于 1970 年代，因为在越战以及布拉格之春的暴力冲突之时，很显然从理论上就需要有一个介乎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瓦尼克的理论正逢其时，甚至享受到了进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待遇；相反，在 1980 年代末，当南斯拉夫放弃工人自治，东欧国家准备放弃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被视为历史的终结之时，KMF 当然也被视为惟一证明有效率的企业制度，LMF 理论自然不再吃香。而且，因为 LMF 模型与转轨经济体中产权改革之间的关键性制度差异，整个 LMF 理论在指导政策制订方面也显得很有限。这种客观条件是使得 LMF 理论走向非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卡尔米在回顾合作社研究时都承认，其实，“LMF 研究计划在其方法论上非常传统，非常主流，而仅仅在其政治意味上与现行资本统治的世界有些异端；因而它不可能进入主流经济学行列；而新制度主义或产权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十分激进，但在政治意味上却相当符合资本统治的传统，因而它仍然可算是主流。”

道的激烈的做法反映了关于 LMF 研究的困境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尽管他著作的分析框架并未超出诸如“团队生产的性质”、“资产专用性”、“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等主流企业理论的范围，但他还是干脆首先亮出自己的道德立场，并批评主流经济学也有道德立场。虽然我们不知道主流经济学的确也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在 LMF 研究方面有歧视行为，但道的这种批评却可能隐晦地承认了 LMF 的研究典型地是具有道德前提的领域，由此，可能将更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排除在研究 LMF 队伍之外。

尽管如此，秉承客观的态度，我们还是进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已有的研究方法优点及缺失是什么？对于 LMF 分析的新古典方法，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想将 LMF 研究合并入主流的方法，而且在历史上影响也最大，在特定时期还影响了微观经济学。但由于关于“人性化”讨论带有先验性，而且没有被有效地结合入 LMF 的新古典模型之中，因而最终影响了其价值。交易费用与产权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其研究了现

参见 Sheila C. Dow, *Economic Methodology: An Inqui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3.

Panu Kalmi, *The Study of Cooperatives in Modern Economics: A Methodological Ess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gress, Mapping Co-operative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3.

实中存在的 LMF 问题，因而更具现实性，但缺陷在于交易成本的不可度量性，使得它无法建立起一个形式化模型；契约理论尽管很主流，但在形式化方面对于 LMF 的复杂性处理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道的现代企业理论被视为今后 LMF 理论发展的方向。但其迫于无奈后所承认的先验性观念普遍存在于 LMF 研究领域的现实，却可能使主流经济学家在涉及 LMF 研究时更慎重。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更主流的方法？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比如，以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处理所谓“人性化”问题，而不是仅借助于心理学或社会学方法。然后有效地将此问题引入模型约束条件之中，并使其在新古典模式内能得到有效处理。再比如，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发展起一套衡量契约成本与所有权成本的方法，以弥补汉斯曼方法的不足。又比如，像道一样使用现代企业理论，通过对 LMF 的治理结构分析，得出更富主流特征的结论等。

但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方向，而如果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无法清除，LMF 的后续研究仍然将面临很困难的局面，而且尤其对于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经济学家，可能面临很艰难的抉择。第一方面，“不幸的是，经济学职业所要求的客观性与 LMF 研究之间总存在某种冲突：对一些有志于 LMF 研究的青年经济学家来说，要获得职业尊重的最好的方式是做出正式的模型并且反映经济学新近的理论进展。然而，在一个主流的框架内，在经验研究中，又很难反映 LMF 的复杂性，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所以，这常常迫使一些研究者使用非主流的框架，但恰恰这种做法既不反映经济学新近的发展又无法满足那些严肃的职业经济学家的要求。”第二方面，“另外一个协调经济学与合作社研究的困难是，合作社研究者都有其道德前提，而这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科学。这一方面降低了经济学家研究此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道德热情却吸引了许多在此课题下从事研究的学生。但付出的代价是研究者不得不反复声称他们对于正面理想的忠贞，或者象道那样明确其道德立场并且面对可能的后果与批评。”

因此，经济学界对 LMF 的进一步研究，就需要经济学家抛开意识形态考虑，转而采取一种“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必须看到，其一，在现实中，LMF 的组织形式尽管较少，并不意味着 LMF 不存在或无法存在。恰恰相反，LMF 其实比 KMF 的实践还要久远，即使在 KMF 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还是有诸多 LMF 组织形式的企业在运作。其二，LMF 罕见，并不意味着 LMF 无效率。关于 LMF 的效率问

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至少从经验研究上看，有许多案例表明 LMF 并非无效率。其三，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古典型企业，在现实中早已发生了变化，劳动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四，采取 LMF 组织形式的合作社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在迅速增加。因此，在这个时候，以一种经济学应有的客观理性的态度将 LMF 的研究推进下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LMF 的深入研究，其成果除了弥补主流企业理论在此领域中的缺失外，还可以反过来丰富与完善主流企业理论，因而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我们同时还看到，在 LMF 研究中强调契约理论之后，的确也吸引了一些有顶尖成就的学者开始进行 LMF 方面的研究。因此，对于 LMF 研究的未来走向，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参考文献：

- Bonin, John P. and Louis Putterman, *Economics of Cooperation and the Labor-Managed Economy*. New York: Harwood, 1987.
- Dow, Gregory K.,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reze, Jacques, *Labour Management, Contracts and Capital Market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0.
-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Right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 Application to Labor-Managed Firm and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52 (4), 1979.
- Tirole, J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etrica*, 69 (1), 2001.
- Vanek, Jaroslav, *Self-Management: Economic Liberation of Ma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5.
-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Jones Bonin 和 Putterman 曾给出了 LMF 分布的相关资料。

如 Bartlett 等人研究发现，意大利小型样本的生产者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比相应的私有企业要高得多；Bradley, Estrin 与 Taylor 发现，英国的约翰·刘易斯合伙企业自 50 年代以来，用英国零售部门的标准衡量，其增长率、利润率和生产率都高于同类 KMF 企业。